

北海文史

第十辑

大通道文化史

浦北发现太平洋西岸沿海国家钱币

邓 兰

【编者按】：桂南沿海各县，以前通往南宁以北的道路异常艰难，与内地的交往主要依靠湛江、潮汕一线。合浦(北海)古代的区位优势，除通过南流江沟通中原与东南亚以外，还能沟通环太平洋沿岸。原合浦郡浦北县发现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钱币，再次证实了历史上这条环洋大动脉的存在。

浦北县博物馆于一九八四年五月至一九八五年底，在当地废旧物资回收部门的协助下，抢救回收的六百多斤古钱币中，有中国、越南、朝鲜、韩国、日本钱币。大量的各式古钱，为钱币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有待于我们用心探讨。现以日本钱币为例，略加叙述。

(一)

日本钱币有大治通宝、宽永通宝、大日本明治二十年一钱，共三种。

大治通宝 1 枚，圆形方孔，草书，对读，直径 2.4 厘米，穿径 0.6 厘米，厚 0.1 厘米，重 3.1 克。属年号钱。日本崇德天皇大治年。前后五年时间，即公元 1126 至 1130 年，中国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至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大治通宝作为年号钱应该是在此时间范围内铸。此钱字体秀丽可爱，是十分难得的珍品。

宽永通宝，年号钱，楷书，对读，圆形方孔，大小不一，轻重不同，计有 79 枚，皆属于同一类型，但根据直径、穿径、厚度、重量，初步可分为五式。具体介绍如下：

1 式：直径 2.1—2.25 厘米，穿径 0.6—0.7 厘米，厚 0.07—0.11 厘米，重约 2.44 克。计有 11 枚。

2 式：直径 2.3 厘米，穿径 0.6—0.7 厘米，厚约 0.089 厘米，重约 2.62 克。计有 20 枚。

3 式：直径 2.32—2.35 厘米，穿径 0.62—0.7 厘米，厚 0.08—0.11 厘米，

重约 2.6 克。计有 8 枚。

4 式：直径 2.4 厘米，穿径 0.55—0.7 厘米，厚 0.08—0.11 厘米，重约 3.07 克。计有 30 枚。

5 式：直径 2.5 厘米，穿径 0.55—0.65 厘米，厚 0.08—0.11 厘米，重约 3.15 克。计有 10 枚。

上述钱币中，有 5 枚背穿上有一“文”字，2 枚背穿上有一“元”字。

宽永通宝。是日本后水尾天皇宽永二年开铸，即公元 1625 年，中国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五年。公元 1706 年，清康熙四十五年开始流入中国。

大日本明治二十年一钱 1 枚，直径 2.7 厘米，厚 0.17 厘米，重 6.8 克，是机铸铜仙。圆形无孔，铸造精整，式样美，与中国清末民初铜仙相似，正面中央有“一钱”字样(直读)，是币值，绕中央的右下左纹饰与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华铜币当制钱十文背面的左下纹饰一样，均似谷、麦、葡萄穗纹。正面的上方有“以百枚换一圆”字样(自右至左半旋读)，这是与银作价，枚与换的中间夹有一圆圈太阳纹。背面中间与中国清光绪元宝一致，是一圆圈蟠龙花纹，绕蟠龙花纹的右下角是“大日本明治二十年”字样(自右至左半旋读)，这是铸造时间。背上方为“1. SEN”数字与日文拼音，即 1 钱。大日本明治二十年。即公元 1887 年，清光绪十三年。

据该县物资局领导和局仓管员介绍，该局库存废铜大都是文革前后在本县回收的。挑选出来的上述钱币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不少尚有泥土，多胶结成串，与中国宋钱、明洪武钱、清钱胶结一起的均有，由此。说明这些钱大多是在该县出土，少量为传世品，埋藏的时间应为清末。

(二)

太平洋西岸诸国从朝韩至越南，自古以来交往密切。秦汉就有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纷繁，也并未有中断。以中日交流为例，以前主要通过朝鲜半岛各国间接进行。魏晋以后，日本迫切要求输入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加强了经由海道和我国的直接联系(中朝中韩更便利一些)。唐、宋、元、明、清，两国的交往继续发展。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末，到我国来的日本“遣唐使”，就有十三次。随同使臣到唐朝的其他官员、商人和留学生也很多，多的时候有五、六百人。中国人也不断到日本去。人民之间的友

好往来对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中国还专门设有海港、市舶司对日贸易，据日本《考古学杂志》1986年8月号报道：由日本德岛县教育委员会调查发掘的位于德岛市中岛田町的岛田遗址，出土了许多从中国输入的宋代钱币、青瓷品及白瓷瓷片等，其中的钱币有元丰通宝、皇宋通宝、景祐元宝、绍圣元宝、祥符元宝、政和通宝六种十五枚；瓷器有青瓷碗、白瓷碗、白瓷水注残片等。这一带是日本镰仓时代(公元1192年—1333年)后期的村落遗址，从出土遗物可以看出它不仅是单纯农业村落，具有渔业和商业性质的贸易据点的可能。日本镰仓时代，相当于我国宋代，这一遗址，是当时中日贸易状况的具体例证之一。

元明时期，日本向中国输出的大多为刀、扇、硫磺、铜、苏木、漆器等。中国输出的主要是银钱、绸缎、布帛、陶瓷等。清初。虽由于德川幕府锁国，中日两国没有正式建立关系，但中国商人仍得德川幕府许可，在长崎经商。

他们贩运生丝、绸缎、绵织品、瓷器、樟脑、书籍、文具以及各省土产到日本，从日本输入银、铜、漆器、海味等。

中日两国由于长期多方面交往密切，来往经商贸易又甚为频繁，作为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货币，必然相互随之流通积聚。但由于日本铸钱较晚，故日本钱流入中国是较晚的事，除宽永通宝外，其它钱币流入数量也不多。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末宽永通宝在我国流通较普遍，数量较多。当时发达的商品交换，使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它的使用范围，空前广泛，对货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而我国当时产铜很少。铜钱虽每年铸造。但因铜的供给有限，不能大量增加，全国每年铸钱数目，平均大概有三十万万文，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加上因为铜器贵而销钱为器的事常有所闻，所以铜钱多少有点紧^②。这就给宽永钱大量流入提供了机会。自然，这是以中日两国经济贸易作为基础的。

浦北，自汉武帝置合浦郡、合浦县始，一九五二年，经政务院批准设置浦北县为止，均属合浦的主要一部分。合浦乃是我区古县之一，历史上大都是县州府郡之首邑，而县州府郡之首邑大多时间是在合浦的北部，即今浦北境内(今还保存有两座古城遗址，分别为自治区和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浦北，原来的合浦，虽地处海角天涯，是我国大陆的最南疆，实属边陲重镇，是政治、

文化、经济之中心。自汉代起又是我国海外贸易几大港口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据有关记载，由于秦时开凿灵渠，沟通了合浦港与中原的水路交通，因此，来自东南亚各国，甚至欧洲罗马的商船都云集合浦港，商品再溯南流江上运至中原，而从语言、风俗、传说、族谱等资料而言，合浦与雷琼、穗港、潮汕、闽浙赣、山东等联系密切。合浦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玛瑙、琉璃、琥珀等舶来品。正是此因，从中可窥见汉代的合浦就已经是个相当繁荣的地方。此外，古代广西的合浦等地，物资资源也很丰富。《汉书·地理志》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地，……处近海，多象、玳瑁、珠、银、铜、果、布之凑。”又有“川泽山林之饶，”可“以渔猎山浅为业，果蔬羸蛤，食物常足。”所有这些条件，对发展商品生产和商业交换都是有利的。所以，此地弃农经商的人很多，经济贸易历来都活跃，尤其明清时期更为可观。除了贩卖珍珠、翡翠、象齿、角外，蓝定行、牛皮鸭毛行，资本皆甚巨，生猪、蔗糖、花生油、元肉、芝麻等副行专与香港贸易，获利亦多。其商店，比如绸缎行、南北货行、洋杂行、药材行皆推广，府人为首资本至少数千元，多则达十万元不等，如咸鱼行则专运售于桂省者亦达十几间，每间资本约三四万元。瓷器质优价廉，在国内亦经常畅销广州、雷琼及桂省(今广西)一带③。经济贸易的繁荣，使外地来往经商者络绎不绝，带来了金属钱币的大量流通；既然太平洋西岸诸国钱币在中国部分地流通，也必然有可能带来了太平洋西岸诸国钱币的流入。所以，今浦北发现太平洋西岸诸国钱这是很自然的。

原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千家驹(此人政治思想不可取，但学术上不应以人废言)在中国钱币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上发言说：“我们的钱币有四千年的历史，光辉灿烂，丰富多彩，在世界货币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亚洲尤其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如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无不受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④。”这一段发言是很有根据的。据大量史料记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与东南亚诸国，在历史上使用中国的铜钱较多。日本，自唐代以来对中国钱就很感兴趣，直到明治维新前均沿用中国钱币为主币。尤其宋熙宁年间，需要中国的铜钱数量很大。他们原自铸的皇朝十二钱。不大成功。公元九五八年发行最后的乾元大宝以后，失去人民的信任，很长一段时间不再铸，而靠输入中国钱⑤。元朝他们继续用黄金来我国直接换取。至正元年(1341年)日本将军

足利直派遣商船到我国贸易，还规定不管交易如何，回程都要交纳铜钱，不得少于五千贯，坚持每年派船来^⑥。日本不但大量使用中国钱，今发现流入中国的日本钱与中国钱币文化的风格也完全一致，在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以中国汉语文字作钱文，仿制出了我国金属铸币中的圆形方孔铜钱，从这一侧面，反映了中日人民的悠久友谊。大治、宽永等钱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两国在历史上文化、经济生活等诸方面的紧密联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中日钱币的交流，在环太平洋西岸诸国(从朝韩至越南)的文化交流中，也具有代表性。

注：①②⑤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③《合浦县志》

④《中国钱币》1987年第一期